



书评

卫宁平原的风云史和英雄壮歌

——读拓兆农长篇小说《黄河儿女》有感

□ 郎伟

拿到拓兆农所著的60万字长篇小说《黄河儿女》，先是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总是被各种事情干扰，无法形成完整的阅读链条。直至作品研讨会日期逼近，我才发狠推开俗务，用了整整五天时间，认真阅读全书。看完全书，心情相当激动。感觉宁夏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又增添了一部分分量不轻的优秀作品。

仔细阅读小说之后，总体感觉：这是一部浓墨重彩书写卫宁地区人民生活命运的小说。一方面，小说描写了“宁安三才”追求光明、参加革命的人生之路。另一方面，小说也多角度展现了卫宁地区的历史变迁、文化风貌和人事沧桑。应当说是一部思想深沉、艺术描写精湛，堪称优秀的长篇小说。

从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广阔度来看，作者创作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大家知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规定了长篇小说不太适合于写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跨度之内的个人生活（包括个人的心理）。当然，我们会发现20世纪之后的西方现代小说、意识流小说，它们常常会以一个非常偶然的生活小事件（小思绪）为出发点，洋洋洒洒地演绎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不太认可现代长篇小说这样的写法。我觉得从各民族史诗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核心的规定性，即它叙述人物命运的背景必须要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我以为，一个人（哪怕是“超人”）三五天的生活，不能写成长篇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之一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行列的作品，绝大多数作品都有“史诗气质”的追求。《黄河儿女》这部小说，我不能说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史诗气质”了，但是拓兆农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在“史诗气质”上是有追求的。这部小说，从描写上世纪20年代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卫宁地区，一直写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宁夏，时间跨度是近30年。在这样的岁月长河激荡中，才可能有壮阔的社会与人生之波澜，才可能映现时代风云之变幻、人生命运之变化，才可能在阅读上给予读者以宏大感和沧桑感。

从小说的思想立意而言，作者是想讴歌三个宁夏籍革命者的人生追求和奋斗之路。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依据20世纪20年代以后，早期共产党人在宁夏的活动痕迹为基本线索而创作的。应该说，三个革命者曲折的人生命运书写构成了小说主线，但小说也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卫宁地区普通人家的生活、命运以及特殊的地域风土和人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既是众多共产党人革命生涯的生动传神的描绘，也是卫宁平原百姓命运和风俗人情的细致写真。

其次，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刻画是多姿多彩的，是可见作者的艺术功底的。这部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提炼是多方面的，对人性本身也有着相当广泛的理解，所以形成了各有性格色彩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小说描写敢于“铁肩担道义”的共产党人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他们是来自于民族和人民的生活深处，来自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和民间优秀文化的滋养。“宁安三才”这三个人物写得都不错。李有才的果决、王绪才的睿智和孙守才的沉稳坚定都栩栩如生，宛在目前。相对而言，孙守才这个人物刻画得更为丰富一些。当然，这与小说给予这个人物更多的笔墨有关。在相对长久的一个时间段之内，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会展开得更充分一些。

小说中一些次要人物也刻画得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大先生张存仁和他的儿子张之简，尤其是张之简的形象刻画得更好。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就在想：在我们这个气象万千变化多端的人世间，有英雄，也有各式各样的普通人。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状态”的斗牛小民。张之简开始向往革命，但是性格比较文弱。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觉得参加共产党的风险太大，于是退缩了，他想老老实实过一种安稳的日子。后来他成为地方保安队中的一名军官，但他内心始终同情共产党人，对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退出共产党有愧疚感。这个人物性格写得好，写出了当时许多疏离革命者的矛盾复杂心情。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写得好，那就是镇长李歪嘴。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有李歪嘴这样的人，有时候很强悍，很霸道。但是经过生活的冲击磨砺或者他人的影响，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你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坏人，那也不是。他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为人尖酸刻薄却又多少有一些向善之心的复杂混沌人物。

从叙事体文学的基本特性说来，长篇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无可回避的艺术职责。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人物立不起来，不能让人长久记住，我觉得就是失败的。《黄河儿女》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所以我说，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多姿多彩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小说中都有反映，包括一些可能在一个章节中出现过的，比如潘小爷，这个人物带有传奇性。清末年间，他做过朝廷队伍里的军官，一言不合，便把上司打了一顿，放下点银子，拂袖而去。我觉得这是民间侠义英雄的形象。

从小说的艺术面貌而言，遵循的还是现实

主义的写作原则。这部作品整体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主要艺术手段。以现实主义眼光来观察反映社会与人生，对社会人生和人性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有利的，有深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作者阅世阅人久矣多矣，又善于思索，故笔下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包括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显现了从容驾驭之功。

我觉得这部作品，在对卫宁地区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的描写上有追求，也有非常好的艺术表现，产生了风俗画效应。小说当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黄河穿行其中的卫宁平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读来赏心悦目。语言是地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卫宁地区的语言非常有特点，它的发音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整个宁夏的语言系统中，甚至在西北的语言系统中都堪称独特。这部长篇小说引用了很多卫宁地区的歌谣，如“中卫的丫头会擀面”等，用中卫话说起来非常好听，带有音乐性。

一个文学创作者，光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还不行，还要有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才可能把地方风情化为令人难忘的文学画面，演绎为生动的文学故事。我感受到拓兆农先生对卫宁地区的历史文化，对这片土地是有深情的。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对它有亲人般的情感。所以，呈现在小说中的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社会风情都生动传神。从宁夏文学的整体创作这一角度而言，这部小说丰富了宁夏文学的“风情描绘”宝库。目前，我们在宁夏文学中看到的情况是，北部川区，由于有张贤亮等人的文学奉献，银川平原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通过《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我们已经充分领略到了。南部山区，因为有“西海固”作家群，有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等优秀作家的付出，我们对“西海固”的风土人情也已经非常熟悉了。宁夏中部卫宁地区的风土人情，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作家们没有提供非常出色的文学画面，读者们对卫宁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风情不太熟悉。《黄河儿女》的出现，弥补了宁夏文学这方面的欠缺。我只嫌拓兆农先生写卫宁地区的历史典故和风土人情，写得还不够多，不够丰富。

另外，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有追求，力图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和古典诗词韵味化为小说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我非常欣赏和佩服拓兆农先生在小说当中，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古典文学和古典诗词的大量借鉴和引用。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

□ 拓兆农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数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了堪称一流的文化和文学。在文学创作当中，怎样才能很好地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去汲取深厚的养分，《黄河儿女》是一个成功示范。我看小说当中所穿插的包括赵县长、冷先生的一些题词和赋，都不错。虽然有些是拓兆农先生的仿作，但那是有功底的仿作，一般水平的作家是弄不来的。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古典小说的创作方式是认真研读过一番的。很明显，这部小说受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的小说影响很深。我猜测，在宁夏大学读书的时候，兆农先生应该是下过功夫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的。

当然，这部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不能一味地说这部小说好到了“不得了”的地步，这肯定不是客观科学的描述。我觉得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对长篇小说文体特征的精准把握上，作者还有所欠缺。作者说创作和修改这部作品只用了一年零四个多月的时间，一年多时间写一部60万字的小说，我觉得创作的时间长度显然短暂和匆忙了些。创作周期的不足和写作上的匆忙，让小说成色上有一些明显不足。比如思想容量的有限性、艺术质地的某些薄弱之处。写作当代长篇小说，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面镜子，50万字的《白鹿原》，陈忠实一共写了五年。如果加上思想和艺术的沉淀期和构思上的准备，还不止五年。

还有一个不足是，小说在结构上没有特别讲究。整个小说的主线索就是按照顺序的物理时间逐步推进。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推进到1949年。这是相当古典的时间掌控和表述。作为现代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可以写得更为复杂一点。可以有一些插叙、倒叙，还可以设置其他一些线索，即所谓的“复线”。这是20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必须有的。我不太清楚拓兆农先生此前有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百年孤独》很好地琢磨过。《百年孤独》作为20世纪最优秀、最伟大的小说，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12部长篇小说之一。如果拓兆农先生把《百年孤独》认真看过，再来写《黄河儿女》，我估计会在结构、思想、艺术手法上多一些启迪。当然，现在的表达方式也还不错，但是太单薄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繁复的艺术”：长篇小说在结构上要有层次感，要有穿插，要设置更多线索——因为人类的生活本身就是多线索的。

小说的第三个不足是艺术手段方面的。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段上过于写实化了，全都是按现实主义的标准、现实主义的标准来创作的。能不能有点变形的、夸张的艺术手法，能不能有点超乎想象的、神秘主义的元素？《白鹿原》这部小说当中有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在在里面，有个“白鹿精魂”象征意象，还有个朱先生，这是个半人半仙的人物。这样的写法在艺术上便是所谓的“出新之处”。

艺术不完全等同于生活，艺术创作完全可以有些超越的东西、想象的东西。我感觉小说故事讲述很平顺，读起来非常好读。但是小说对于人类幽深动荡的内心世界的描述和对人类生活本质的揭示方面，稍微显得薄弱了一点。如果艺术手段更丰富一点，这个小说的品质会更好。

定要让它承载更多的东西。在创作中，我总是要贯彻我对人性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人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即便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就是说，他们身上都有善与恶的元素，只是二者的比例不同。同时，随着环境、经历的不同，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转化。而所谓“环境”，有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或者说是“教育环境”或“教化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可以向善，也可产恶；可以造就英才，也能孵化奸雄。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教育环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可以是思想的教导，也可以是现实环境的迫使。

四是谈谈语言风格。小说总体是以“历史老人”的口吻叙述回首历史的，我有意识地讲求语言的平淡自然、诙谐有趣，注重使用民间俗谚和方言。另外，小说中我使用了大量民歌、古诗词，目的就是增强小说的表现力、提升可读性。

长篇小说的载体很大，语言风格可以因人、因势而用。叙述语言讲求统一性，人物语言可以因人而设。小说写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也是由别人去感受和评论的。想不好，就写不好；但想得好，也不一定写得好。这牵扯到天赋、历练和学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五是谈谈作品存在的不足。说实话，我的这部小说是存在一些明显不足的。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结构不够繁复、心理描写少、细节描写不够细腻、一些人物形象塑造缺乏辨识度等。这些意见都是很中肯的，也是直指“命门”的。

文学永远是缺憾的艺术。如果以后能够再写的话，我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回归小说的本真，并力争有新的突破。感谢那些远逝的英烈和革命前辈们，感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的这些不怎么成熟的作品，就像是一束开放在黄河岸边的野花，虽然没有牡丹“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国色天香，但它盛满了“一个黄河子孙对革命前辈、对故乡大地的无限敬意和感恩之情！”



词一首

满江红·致拓兆农先生

□ 范学灵

挑灯操觚，新猷开，鸿篇巨制。世道篇，跃然纸上，开卷有益。香山巍峨扬大道，黄河儿女雄姿俏。凝正气，功德壮波瀾，勤耕耘。

中卫邑，芳华现；杞乡梦，驻心间。柳桑棹风韵，纵横捭阖。激扬文字鉴乾坤，笔走龙蛇慰英魂。捧祥云，绘就华章锦，拊掌贺。



随笔

□ 李 收

烈日下的农民工

六月，正是盛夏时节，天气也没有了春天的气度和柔情，烈日当头，骄阳似火，这样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就有这么一群农民工兄弟，为了抢修街道的工程任务，顶着烈日的暴晒，汗流浹背，时而修整这一路段，时而又整修那一段。

环境的拥堵和嘈杂并没有影响施工者干活，他们专注、用心敲打着每一块砖石的棱角，尽量做到零偏差，生怕影响到路人前行的步伐。是啊，老年人走路需要脚下的平实安全，年轻人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步调，儿童需要脚下的欢乐，这一切仿佛都掌握在工人师傅的手中。发电机的轰鸣，电镐的破击声，切割机的刺耳声，声声入耳，但这些都杂的声响一点也没打乱他们干活的思绪，仿佛成了大街上杂乱而有序的乐章……

街面修复施工的质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些地面鼓起和下陷程度是相当严重的，但都被修复得平平整整，年久失修的窗井盖周围也做上了小石子压花造型，花池和台阶也修得平实如初。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政府对施工进度也有要求，争时间抢进度是每个劳动者心目中的方向。中午他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和吃饭时间，有些工人吃些快餐后在大街上席地而躺，休息一阵子，接着就进入了繁忙的劳动中，有时临街的店面老板看到他们卖力的样子，拿出自己的凉茶递给工人们解渴，更增强了师傅们的信心。

吃水不忘挖井人，行路更思修路者。看着修复的路面和街道崭新如初、平整舒适，每个市民都无不敬仰这些烈日下的农民工，为他们的劳动付出点赞。



枸杞红了(农民画) 马春燕作

不应忘却那段历史和英烈们

“我们不应忘记历史、忘记英烈、忘记我们走过的路。”这是我在“后记”中写的话，也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具体来讲，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个人情结。我想，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大概都有一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使然、环境使然。正如我在小说“题记”中所说的那样：“年少时，在心中撒下的第一粒种子，往往是最纯真、最执着、最具生命力的。”少年时的这种英雄情结，可以影响人的一生。除了教育的影响，其实，英雄情结也是人性中最具光辉和生命力的道德元素之一。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要为家乡的先烈们树碑立传。上世纪前半叶的四五十年，是一段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悲壮历史，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铁血历史，更是一段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历史。那么，在这历史大潮中，在我们宁夏、在我们中卫，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我们宁夏人，又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出了什么力？或者说，我们的英雄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黄河风云》时，查阅了大量资料，而且在那部小说里也有反映。直到后来，我又读了不少资料，才发现在那个时代，尽管我们宁夏处于偏僻的大西北，但未能置身事外，甚至景况更为惨烈。而且，在我们宁夏，尤其是在卫宁地区，也不乏精彩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载入史册的英雄人物。像张子华、孙殿才、李天才等人。要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

年，即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驻扎银川时，便建立了第一个宁夏党组织。1926年国民革命军路过中宁时，15岁的孙殿才就成为卫宁地区第一个共青团员。就是说，宁夏和卫宁地区是最早点燃革命火种的地方之一。如此深厚丰富的红色历史，应该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宝藏。我还想，家乡人写家乡的历史，写家乡的英烈，传扬家乡红色文化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我有如下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一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真。小说中的诸多历史事件、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我都是尽最大可能还原其原貌、力求其真实性。所以，在小说中我十分注重注入那个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时节的大小历史事件、故事传说、生活场景等，可以说，涵盖了那个时期宁夏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那个时期社会状况的反映，也用了许多笔墨。

在细节等方面，我也竭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像国民革命军部队驻扎中宁，冯玉祥将军为“四海客栈”田掌柜赠送对联和诗词。当年宁夏城、北京车站、大前门的场景就是那个样子。尤其是宁夏城的各种吃食、饭馆、建筑位置布局，也是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原貌。

二是最大可能地尊重人物原型。如何写好英烈，或是塑造好人物形象，也是我在一直考虑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要最大可能地尊重人物原型。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

是有原型的，“宁安三才”就有张子华、孙殿才、李天才三位英烈的影子。即便不是不少次要人物也不是虚构的，很多真实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刻意塑造他们，或是用很多的笔墨虚构故事。我在查阅资料过程中，读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形象就已活脱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了。

在人伦道德修养方面，他们也是可以圈可点的，我并没有怎么拔高他们。这些革命前辈，不但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共产党人忠诚、无畏、甘于献身的党性特质，而且，在他们的身上，还闪烁着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人性光辉。正如我在“后记”中写的那样：“在我看来，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还是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着跨越党派、民族、地域和时空的诸多人性亮点！”

主要人物的原型本来就立体丰满，所以，在创作中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塑造。在写作过程中，随着他们一步步成长的足迹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只是进行了文学化的叙述和描写，或者说是作了一些合理性的推演和想象。在我大多数的写作状态中，我脑海中飘转的不是“文学的他们”，而是“复活了的他们”，我只是把一只只破碎了的瓶子，复原了而已，或者说，把一座老屋翻修了而已。我想，过多的“美化”，就是亵渎了他们。

三是最大可能地注入思想内涵。思想是文学作品的灵魂。60万字的长篇小说的确是件浩大的工程，它的承载量很大，所以一



创作谈